

17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一丘一壑皆文章

《饮中八仙歌》与盛唐诗仙群体

道家文化表象下的“唯物主义”内核

征询类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考察

新世纪英美及中国学者奥斯汀研究综论

文本生产与经典重塑

中文学术前沿

第十七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卷外语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中文学术前沿

第十七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文学术前沿. 第十七辑 /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6
ISBN 978-7-308-20859-8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社会科学—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41160 号

中文学术前沿(第十七辑)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吕倩岚
责任校对 吴 庆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0.5
字 数 297 千
版 印 次 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20859-8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中文学术前沿》编辑委员会

学 术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骧 严家炎 吴元迈 吴熊和 裘锡圭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云路 王德华 方一新 冯国栋 池昌海

孙敏强 苏宏斌 李咏吟 吴 笛 吴秀明

汪维辉 张涌泉 张德明 周启超 周明初

胡可先 姚晓雷 徐 岱 徐 亮 陶 然

黄 健 黄 擎 黄笑山 盘 剑 楼含松

主 编:胡可先

副 主 编:吴 笛 池昌海

本辑执行主编:吴 笛

目 录

名家讲坛

一丘一壑皆文章

- 我经历的唐代文学研究学风变化 陈尚君(1)

古典文献学

- 《饮中八仙歌》与盛唐诗仙群体 胡可先(16)
- 《无象照公梦游天台山石桥颂轴》
——宋人茶道与诗之存档 黄 杰(27)
- 日本影弘仁本《文馆词林》所存三国文价值考论 林家骊 汪妍青(32)
- 韦庄《秦妇吟》异文辨析举隅 张译丹(43)
- 杭州丁氏刻书中的外地刻本考述 陈东辉(48)

现当代文学

道家文化表象下的“唯物主义”内核

- 阿城《棋王》的另一种解读 俞欣恬(59)

特殊环境下人性“秘密素质”的探寻

- 从《白蛇》看严歌苓的女同性恋题材书写 戴 玥(69)

穆旦诗歌中的“流放地”与“受难者”

- 基于1940年代与1976年创作关系的一种考察 滕 甜(79)

汉语言文字学

- 征询类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考察 周明强(88)
- 宿松方言“(S+)V+个+N”中的量词“个₁” 黄晓雪(99)
- 杭州方言的“来东” 姜淑珍(104)
- “断断”及所在否定句内在机制 陈 思 池昌海(112)

域外视野

- 新世纪英美及中国学者奥斯汀研究综论 龚 刚 乔 乔(120)
- 英国儿童文学中的国家想象 张生珍 刘晓书(126)
- 论诗歌抑扬格的民族形式 [俄]日尔蒙斯基著 吴笛译(132)

会议综述

文本生产与经典重塑

- 唐代文学读书会第二次会议暨“抄印转换与文学演变”工作坊会议综述 ... 杨 琼(145)

多元互动与出版视域更新

- “数字时代的读写文化与出版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蒋三军(155)

一丘一壑皆文章

——我经历的唐代文学研究学风变化

陈尚君

编者按：本文是陈尚君先生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开设讲座的记录。陈尚君先生是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在唐代文学研究领域成果卓著，著有《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编》、《唐代文学丛考》、《唐诗求是》、《贞石论唐》等。在中华书局新修订版的《二十四史》中，陈尚君负责《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三部史书的修订。其治学文史贯通，展示了学术研究的大格局。作为名家讲坛，陈尚君先生通过自己四十年的研究经历，展现唐代文学研究学风的变化。

—

我今天讲这个题目，是因为论文答辩时，华东师范大学的胡晓明教授，悄悄和我讲，他说我原来给一个学生的书写的序，其中有一段话给他印象很深，“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可以写出学术论文”，比较典雅的表达，就是“一丘一壑皆文章”。印象中这是南宋人的诗，南宋人应该有类似的句子。胡老师说这次是给研究生座谈，我起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研究生期间最大的烦恼，就是不知道学术论文的题目从哪里去找。我愿意在这里和大家讲我自己的心得，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天下的文章都已被前人做尽，唐诗尤甚，我不知道，前人还给我们留下了多少的机会，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当时觉得能够发一两篇文章，平生之愿已矣。但是最近几年中，我自己写作或是发表的节奏，基本是每个月三到五篇文章，而且每一篇都希望有些新意。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好文章都被别人做完了，人生有涯，文章无尽。

去年江苏凤凰出版社的《古典文学知识》第200期，它向我征文，我交了一篇文章——《大唐王朝的第200年》，因为200期，所以我做了“第200年”。马上就有人评价说，这个每一年都可以做，大家想想，这个题目就开拓出另外的288年，有多少题目可以做。换句话说，唐代的每一诗人，每一首诗，都有他的流播史和学术史，都是值得做的。做史学的朋友告诉我，对于长安的城市史、文化史的研究，每一个街道，每一个坊里，都是值得做的。把整个长安城解剖开来的话，这个坊里，它的左邻右舍是什么，有什么官舍，有什么园林，谁曾经住在这里，碰到了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缘由，其实都可以做。但是现在的情况之下，做研究生学位论文，困难之处在于，在两到三年中，要有一个重大的选题，要能够完成一个20—30万字的专著，而且博士学位论文，还应该在学术史上有重大的突破，一般的还不够，因此，对同学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

其实不仅是你们，我自己在1980—1981年间做学位论文，我们当时还是硕士——那时，只有硕士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的人才去读博士。我不知道胡老师后来有没有读博士？（胡：我硕士没读。）我们当时是没有这样的要求，不像现在一刀切，博士学位拿到后找工作如果很困难，还要做博士后。我们那时候非常简单，但是那时候我用力非常之深。当时做欧阳修的研究，我把欧阳修的生平著作和所有的作品系统地清理过，然后交这个作业给朱东润先生，朱先生讲了一句话：“如果是像你这样做的话，三年做一篇论文是不够的。”所以我想，不仅是我那个时候，你们现在也是远远

都不够的,但是你们大家都很努力。

下面的话我是要告诉大家,天下文章的题目到处都是,在于你怎么发现,你有没有能力驾驭,你有没有力量把这样的论文做出来。所以我后面是要讲到,我经历过的几十年之中唐代文学研究的学风变化。首先要讲的是,我在1970年代末所接受到的教育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第二,1980年代以后唐代文学研究以及其他方面可以看到的风气的变化;第三,最近几十年之中的新的文献的出现;第四,现在研究观念的转变对于我们现在学术的启示意义;第五个,古籍数字化以后对于传统学术的挑战。我想讲的主要是以上几个方面。

二

我是1978年考取研究生,运气非常之好,当时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在校期间,顺风满帆地报名考试。因为在学校以外的人没有我有优势,我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馆,所以当年报考,虽然我自己一点底气都没有,但是复习了两个月,把全部大学期间的课程都上完了,而且考了以后居然考到专业第一。回顾起来,当时获得的一个很高荣誉是1978年上海市三好学生,而且当时我的光荣事迹就已经上了上海的《解放日报》。当年我是不知道的,一直到近几年,《解放日报》完全地数字化了,以前的报纸都可以检索,我才知道,当年居然对我有过报道,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们在1978年开始研究生学习,专业课是导师开,专业基础课由教研室开,一般的阅读和研究,都利用当时的图书馆。大家可以理解,当时的图书馆,所有的书都是“文革”以前出版的,“文革”期间出版的书,其实很多我也读过,像《李白与杜甫》,像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都读过,对我自己来讲的话,影响很大。但是当时一般读的书,其实还是很少。

在1978开始的研究生的教育中,非常明显的就在于,专业的方面,导师主要带我们读唐宋诗词文章,朱东润先生他这一届带的是唐宋文学。我们的专业基础课,由王运熙先生负责开,当时王运熙先生管我们这届的六个研究生。王先生的专业基础课是三门,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思想、中国古典文学,每一门讲几次,讲一些重点。中国古代思想,主要带我们阅读《论语》、《孟子》、《老子》、《庄子》,佛教王先生也不太懂,所以佛教基本上是没有读过。当时讲思想史,都是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其他的书都不太流行。中国古代史,王先生主张读《史记》、读《汉书》,另外我们还讲《资治通鉴》。因为复旦始终有这么一个好的传统,就是把史籍的阅读当作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来做。朱东润先生有一句名言,他问某一位先生,你是研究什么的,回答说,我是研究现当代文学的,朱先生说,研究现当代文学应该从《史记》读起哦(笑),他是提倡这样的。复旦的传统讲究古今融通,而且很注重在文学作品之中读出属于人性的光芒,这是复旦长期的传统。王先生讲文献学的话,他讲目录学,目录学讲三次,第一次讲《汉书·艺文志》,第二次讲《隋书·经籍志》,第三次讲《四库提要》。王先生说,特别是《隋书·经籍志》,对于六朝文学之研究是非常之重要的。

但是王运熙先生基本的路数,1978年王先生的表述,和1988年的表述就不同了。因为老先生已经不在,而且我们也非常尊重老先生,关系非常好,稍微带一点调侃的话就在于,王先生在1978年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说,我一生做得最好的工作还是关于六朝乐府与民歌的研究,到了1988年的时候,他开始做批评史了,越做越红火,所以他已经不太乐意讲这个话了。但是,这是王先生学术起步阶段主要的工作。王先生还有另外一段话,我也愿意在这里传达,王先生说,我在复旦虽然碰到很多老师,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四库提要》。王先生认为,《四库提要》这种治学的方法,是讲究学术源流,讲究批评之中提出的问题和中肯恰当的评价。王先生告诉我们说,近代以来的学术有很多的流派,比如说疑古派、考古派等等,王先生自我定位为释古派,这个释古派就在

于对古代文学现象的阅读、解释。

王先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1926年出生的,1949年开始发表论文——那年在《国文月刊》上王先生就发表了三篇论文,因而在年轻的时候一下子就成名了,当时年纪真的非常之轻。而且王先生在做青年教师的十来年中,始终也没有结婚,后来有人调侃他是“忙记特了”(上海话“忘记了”)。后来他带研究生的时候,他特别喜欢和学生讲,要结婚还是要早点结婚。我们系里毕业的一位前辈,现在上海大学的董乃斌先生,是196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董乃斌说,有一次上课中间休息的时候,王先生很高兴地讲,我最近生了一个儿子(笑),这是很高兴的事。我在这里所说的,是想要告诉大家王运熙先生他的授课,以及种种基本情况,王先生还指导我们进行《文心雕龙》基本的阅读,《文选》之阅读,以及讲授阅读作品的基本方法,等等。

另外一位给我们授课的就是朱东润先生。讲自己的老师,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朱先生是一位大气磅礴的学者,朱先生喜欢谈古今兴亡,喜欢讲历代帝王之得失,朱先生特别喜欢提一点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项羽到了乌江为什么不肯过江东,又比如说侯生送信陵君去援赵,侯生自杀而送行,为什么侯生要自杀,等等。朱先生喜欢问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当时都是无法回答的。到了前几年,我整理朱东润先生的遗著,出版了朱先生的文存,把他早年所有的论著都仔细看了,读老师遗著的过程中,当年无法回答的问题,逐一得到了答案。前辈的学问,他有他特别的地方,我在朱东润先生身上学到的东西是,读书应该讲究融会贯通,应该纵横古今,应该中西兼顾。朱先生是教中国文学的,但是他在早年有十五年教授英语,他到武汉大学之初都是教英语的。同时,朱先生讲,你只有了解西方文学研究的方法,你才能看到中国文学之长处和短处。所以,在朱先生本人的治学之中,早年在文学批评史、《诗经》、古史等等方面的研究都已经卓有成就的时候,朱先生转而做传记文学的研究。

什么是传记,朱先生说,1930年代末的时候,当时教育部要求各高校开传记文学这门课,当时中文系教授纷纷在传记文学课上开设韩柳古文阅读,朱先生觉得这个不对的。朱先生讲,传记文学不是指《史记》之中的传记,也不是指韩柳的古文,朱先生特别说明一点,所谓传记文学,应该是欧洲的那一种文学,应该是英国的那一种文学,应该是对于一个人一生的生平、行业和出处,以及他的言论、事功、交往、作为,应该是系统地进行分析研究以后来提出的问题。所以当时多认为韩柳古文、碑志、行状都是传记,朱先生却不这样认为。朱先生的看法很激烈,像梁启超的《王安石评传》,当时影响非常之大,朱先生认为,文中的王荆公,他的政治是政治,文学是文学,诗是诗,文是文,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文章的做法,但是这样的传记把王荆公这个人大卸八块,只有各个方面的成就,没有一个完整的人。因此,朱先生讲,传记文学,特别的地方就在于,它要求对于一个人所有的文献,所有的作品,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详尽地加以了解以后,来阅读和理解这个人。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各位是否能够理解,我们现在可以看英国的传记文学,看欧美各国的传记文学,我最近几年,各种传记看得非常多,所以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有历史小说,有新编历史剧,没有严格意义上、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真实还原古代历史,或现当代人的作品其实是没有的。朱东润先生在1940年代初做的《张居正大传》,是另外一种面貌。《张居正大传》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他把张居正所处的时代,特别是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之关系,以及和朝廷最大宦官冯保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朝廷之中各个宰辅之间复杂的矛盾,全面地加以揭示,可以看到一个人一生的事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朱先生治学的一种格局和气象,我在这里讲得尽可能随意一点,让大家可以理解。但是以我当时的学力,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我觉得以朱先生的才力,以及以他的学养,他的一生后面的四五十年,全力以赴地在做各种各样的传记,他是希望给中国文学开出一条新路。但是实际上,我作为他的学生,既没有能力继承,而且回过头来看,中国当代,在传记

文学方面,非常之薄弱,大家愿意胡扯,愿意虚构,愿意见论,但是不愿意很花气力地把历史人物之真相完全弄明白。从这一点来讲,真的(在)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我举现在的例子来讲,现在欧美人物的传记,我们可以看到本人的回忆录,如二战期间美国最有名的将领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他们自己的回忆录,详尽地讲自己一生之功业。但是欧美还有另外一个好的传统,除了他们自己的表述之外,还有对他们的最权威的传记,这类的传记不是听一个人说话,必须综合各种各样的材料,来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真实的情景。比如麦克阿瑟自己的回忆录,现在也翻译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麦克阿瑟非常了不起,他实现了“二战”期间几次重大战役的胜利。但他也曾经惨败过,而且别人给他写的回忆录中,可以详尽地说明这个地方失败了,他自己写的回忆录则总是有所掩饰。比如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日本突袭美国夏威夷,同一天稍晚时候日本突袭美国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军事基地,此时麦克阿瑟还没有回过神来,导致美国在基地的100多架战机几乎全被日本轰炸。对于这件事,麦克阿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一笔带过,似乎这件事与他没有关系,但别人给他做传记,就必须把这些事情全部说出来。你看麦克阿瑟自己的回忆录,他在朝鲜战争后回到美国,就是一个伟大的英雄,到处发表演讲,真的感动了一代人;但是如果看麦克阿瑟的传记,别人来写他的话就非常清楚,麦克阿瑟在朝鲜试图扩大战争的规模,违反了美国总统所确定的国家安全政策,影响世界和平的总体格局,所以总统罢免了他。麦克阿瑟在国会接受了四天的质询以后,对于其违抗军令的行为,舆论几乎一致批评和谴责,当时有人鼓动麦克阿瑟去参加总统的竞选,但实际上他几乎连门槛都进不去。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这一类作品,两者之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朱先生所提供的这样的古代文学研究的路数,尽管我们现在还很难完全达到,但是他毕竟是看到了以英国为代表的传记文学对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启示。所以我在这里说到以后,也是有一些这样的感触,当时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办法体会,更加没有办法实践的,能够完成一段学业,完成学位论文,大概已经算是很好的事情。

如果在这里和同学们谈当时的心情,我觉得有一点非常特别,整个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之中,社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各种能看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自己的学问与日俱长。这种心情可以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中体会到,我记得和我太太在谈恋爱的时候到过杭州,在保俶山上转过去的地方有一片竹林,经过那个地方,就能听到竹笋啪啪啪往上爆的声音,感觉个人学问的成长好像就是这样的情景。去年《解放日报》报道我,用了这么一个题目(《万物复苏爆笋声》),我觉得也是蛮高兴的,我的确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发展成长的。

那么我回过头来说,在1978年到1981年我学习期间,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依傍前辈的工作,做一点摸索,做一点探讨,但是在摸索和探讨中也会有一些特别的收获。我这里讲到自己当年所做的工作,一个是与原杭州大学的前辈夏承焘先生有关。夏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我在1980年左右很认真地读过,仔细地体会那种治学方法,而且找到一点问题,我在最初的时候就写成过文章。在1979到1980年间,我写过《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夏先生用顾学颉先生的说法来考订温庭筠的生年,其实是对于温庭筠一首诗解读之不同的判定。我重新提出另外的说法,把温庭筠的生年往前推了十多年,发表在1981年的《中华文史论丛》上。当时文章的发表,主体材料应该说夏先生已经提供出来了,我是对一些文本的解读有所不同。当时的那篇文章,朱东润先生看到以后很高兴,说问题挖得很深,朱先生也是很直率的好老师,朱先生说,文章还有不少夹生的地方。所谓夹生的地方,在当时,施蛰存先生给过我一封信,指出来近年来刘学锴先生写《温庭筠传论》、《温庭筠全集校注》有好几处指出了我那篇文章中的错误,我觉得这是初学的阶段可能容易犯的问题。

第二个我觉得当时也是比较得意的一篇文章,是《杜甫为郎离蜀考》,那篇文章的初稿是1979年的夏天写的,因为朱东润先生出了题目,叫“大历元年后之杜甫”。当时感觉,杜甫几乎已经被前

人做透了,几乎很难有新意。朱东润先生讲,冯至先生的《杜甫传》已经写得非常好了,我不能再写一本《杜甫传》。因此他的“杜甫传”的名字叫作《杜甫叙论》,而且关于杜甫生平的基本轮廓,朱先生在全系的学术报告上做过讲座,因而说杜甫生平的大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当时我想体会一点治学的方法,所以也愿意做一点尝试。那是研究生第一学期末的时候,我把学校图书馆里关于杜甫的书全部借出来,带到南通去,用一个暑假的时间写了三篇五万字左右的文章,其中后面两篇到现在为止没有发表。但第一篇文章,我觉得自己真正有心得的,就是提出杜甫离开成都草堂并不是因为严武去世,而是因为朝廷给杜甫颁授了检校工部员外郎。宋代以来所有的解释都认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是一个虚衔,并没有那么一回事,杜甫是以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身份入参严武的剑南节度幕府。但是我把那个阶段所有的作品,所有的解释,以及唐代的制度、官职制度史的文献详尽地加以解读以后,穷加追究,包括杜甫所有的诗对这段经历的叙述,然后重新解读,严武去世是在杜甫离开成都草堂以后,而杜甫知道严武去世是在夔州,在三峡时期。杜甫在严武节度幕府之中,他穿什么衣服,他是什么身份,以及朝廷如何把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职颁授下来,以及唐代的检校官制在玄宗时期到肃代时期到德宗以后的变化的痕迹,以及杜甫这个阶段所有诗里自己的说明,我详尽地加以解读。我觉得除了清代的浦起龙有一句的怀疑以外,我整个结论几乎全部是首先提出来。这样的解释,对于我个人学术的起步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证明从宋代以来,千家治杜,明清两代,无数的学者加以解读,现当代的学者有许多的考证和解说,但是这么重大的问题,居然没有一个人说清楚过。这个情况,对我的一种触动就在于,只要方法科学,对于历史的问题、文学的问题,穷究文献,追索真相,其实有许多问题,都可以探索清楚。

我这篇杜甫的文章发表得比较晚,最初发表的是温庭筠的文章。我1981年到北京见到傅璇琮先生的时候,傅先生告诉我,这篇研究温庭筠文章他看过了,而且他在北师大论文答辩的时候也曾经讲到过。但是我也客观地说,我那篇文章中对于唐代作家生平的研究,基本的方法还是《唐宋词人年谱》的方法。我在这里没有任何的轻薄之意,我想说明,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在清末到民国以来治词学的学者之中,是非常了不起的著作,包括近年来夏承焘先生的日记、文集,以及《唐宋词人年谱》的续编,我都仔细地读过,我觉得在这之中,他花的气力,他对于唐宋词人生平的钩稽,是已经超过了他的前辈许多的。但是如果仔细地读,又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夏承焘先生的工作中,文人气、才子气很重,他的治学,是从各种书之中钩稽文献,然后加以排比,他的排比以及对作家生平的考证,是一种排比归纳式的方式,比较传统而庄重。传统之中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对于文献到什么程度的解释,他的分寸拿捏非常好,他有许多优长的地方,仔细地阅读,能够知道涉及的问题以及处理的方法。

我见过一次夏承焘先生,是1981年6月到北京去,住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的一个地方,坐的时间不是很长。当时夏先生显然记忆已经不是太好,我在那大概坐了一个小时不到,夏先生至少问了我五次以上,你府上是哪里的,同时,我陪他一起看电视,电视在放西安事变,夏先生反复讲,这个地方我去过的。临走的时候,他叫夫人送了一本签着他的名字的书给我,当时我感觉他已经不能多谈学术方面的问题了。

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唐代文学研究最特别的著作,就是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诗人丛考》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从一流作家的研究,降而研究初盛唐二流到三流的作家。傅先生说,他受法国社会学派的影响非常之深,他说,一个伟大作家的出现,应该是一大批的艺术家同时涌现的结果,所以他把目光投向二流或是三流的作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特别推崇治唐史的陈寅恪或岑仲勉这一类学者的研究成绩,他认为,唐史学者,对于文献之占有和解读,特别是对于文献解读中可靠的文献和传说的文献,要能够严格地加以区分对待。傅先生的《唐

代诗人丛考》又一个最特别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以前的学者认为研究唐代文学最基本的典籍,如《唐诗纪事》、唐人笔记、《唐语林》、《唐才子传》——我们读书时认为,研究唐代文学首先要从这些书着手——傅先生提出,这些传闻的笔记,只不过记载了一种可能性,并不一定完全是历史之真相,而历史之真相,更可靠的东西是作家本人的作品,是这些作品和其他史籍相联系起来的一个真相之考证和推究。我觉得当时这样的说法对我们的冲击非常之大,我相信胡老师也是那时候开始读书、写文章的,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也就是说,用史学解读唐代文献的方法,转而解读唐诗有关作家的生平和作品。

当时的影响非常之深,我们现在的文学史课,常常会讲到,唐人薛用弱的《集异记》之中,关于旗亭听诗的故事,几个歌女,分别唱几个有名诗人的作品。傅先生考证这几首诗是什么时候做的,根据王之涣本人的墓志,他去世于天宝初,高适的诗则写在天宝八年以后,高适的诗写在王之涣去世以后的若干年,怎么可能一起听歌女唱这首诗呢?其实就是,在这中间,把文学之传说和文学之事实进行区分;另外再一个,确认了在文本阅读之中,哪一些点能够绝对地系年,从系年之扩大,再转向于对文学家的生平,以及他的作品为什么而做的探究。这种方式,在傅璇琮先生最初写的几篇文章,包括对韦应物生平的考证,刘长卿生平的考证,拓清了以前许多笔记传说中的误解。这样的工作,转而对于唐诗的文献,特别是唐诗的文学作品,有了全新的解读。比如,在刘长卿的研究之中,我们可以知道,刘长卿的出生比原来闻一多的推证晚了很多年。而且可以知道,刘长卿在考进士的过程中,几乎是一个像学生领袖一样的人物,当时叫“棚头”。除此之外,在刘长卿的一生中曾有两次贬官,这两次贬官的过程,通过他的作品,以及作品之中涉及的人物,有关活动的情景,真实地还原了刘长卿两次贬官之始末,将两次贬官加以区分。把刘长卿的生平搞清楚后,再来推证他的作品,那些作品到底在讲什么,因而对这样一些作品的解读和还原,使我们知道了唐代文学若干个真实面相。

我觉得和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比较来讲,两部著作的关注点其实都是唐宋作家的生平,但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傅璇琮先生)不是简单地排一个年谱,而是在若干个可靠点的切入方面,深入进去,同时,拓清了事实和传说之间的距离,尽可能通过真相之还原,来解读作品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具有一种很特别的启示意义,在1980年代前中期的时候,傅先生这样的著作,影响非常之大,而且带动了一批学者之工作。这样一批学者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有几种。首先,是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中唐部分是胡可先老师和吴汝煜老师都参与做的。我和陶敏先生熟悉傅先生稍微晚一点,到1986年以后,才有很密切的来往,当时《唐才子传》的作品已经全部约出去了。到了1993、1994年的时候,那套书四册出齐了的时候,我是没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蛮好。陶敏先生说我觉得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些问题,傅先生也是一个好人,傅先生说,你看到有问题就把它写出来吧。我们陶老师一起劲,一下子写了十五万字,十五万字写出来以后,大家要理解,出一本书太薄了一点,附在一本书的后面又多了一点,傅先生就找我说,是不是你再写一点,于是就有了《唐才子传校笺》的第五册,第五册是对前四册的补充和校订。因为当时,我的工作做了《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我在面上的书看的多一点,所以补充在前面做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的文献,陶敏先生的工作主要是对这些作品之中具体的人物和事件之解读。所以那本书,有一个评价是很好的,北京有一位做建筑的学者叫曹汛,曹汛说,这一本书里面可以看到我和陶先生的工作,一个管内,一个管外,陶先生是管唐诗的内证,一首诗不同的解读,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我管外证,补充了一批东西。其实到现在为止也已经二十多年了,有不少新的零星的材料之发现,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心思做大的补充了,应该来讲,重要的作者的研究,这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变化。

傅先生本人做了很多有益于学术建设的工作,他的另外一部著作是《唐代科举与文学》,《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出版,印象中是1986年。傅先生这个工作的意义就在于,他和前面一本书的风格完全不一样,他实际上是对唐代文人在科场上的活动,进行了鸟瞰式、全景式的扫描,长卷式的展开,把唐代文人生活的各种场景展示给我们看,在这种展示的过程之中,讲清楚唐代文学的各种生态面貌,同时把文人活动的场景一一地描述出来。这本书前几年获得过思勉原创奖,我也很荣幸在傅璇琮先生的去世前夕完成了颁奖。现场是我去做了点评,傅先生获奖的致辞,是由他在清华大学带的一个学生根据他的口授起草的,几乎是可以看到的傅璇琮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文章真的写得很好,我的文章也写得很好,我的文章2000字,中华书局的徐俊评价,我这2000字把傅先生一生的学问讲透了,所以在傅先生去世前十天登在了《中华读书报》上。这篇文章被《中华读书报》的记者改了一个题目,叫《一部书与一种研究范式的确立》,我觉得也还是讲的得当的。因为当时傅先生还在,所以我的文章之中,也有几句调侃的话,非常友好的调侃的话,大家可以在文章中找到来阅读。这个话是这样:一句话是引到了陈允吉先生的话,陈老师讲,老傅的文章写得越来越好,写得就像陶渊明的诗一样,这个我觉得在场面上讲起来是很好听的话;第二句话,是说傅先生一时有“广大教化主”之誉,大家也有体会,傅先生对于年轻人提携很多,大家也都很尊重他,所以用到白居易的“广大教化主”,在这种场合下这样的文字,稍微有点调侃的意思,但调侃真的是非常友好而尊重的,也是大家可以理解的一种场景。

总的来说,这种转变,实际上是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而且是在一段时间中带动了唐宋文学研究的整体繁荣。这种繁荣带动了对于唐人所有作品的追究和考证,对于所有唐代作家研究之展开,也带动了文学与各种社会问题的比较关系研究的展开,以至于后来许多学者做唐代军幕与文学,唐代铨选与文学,变成一种学术范型的工作。这种方面,他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三

开始讲的几点,现在可能有一点乱,大家就顺着这样听吧。我想讲的另外的一个方面,在我自己开始学术研究的过程之中,很大的触发就在于,唐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到底有多少,怎样看待和评价前人的著作。也就是说,在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我感觉清人的工作是不可超越的,是无法讨论的,因为我们讲起来乾嘉学派,那个真的是给我们庄严肃穆的感觉,人家都是一生的投入,而且《全唐诗》、《全唐文》都是经过皇帝领衔的皇家工程,当时最有名的学者都参与了,似乎是不容挑战的,不容怀疑的。但是在接触文献,在某一些局部看到问题之后,就会产生疑问,就会引起警觉,这种疑问在最初的时候,是偶然的。我最近找出1978—1979年间南京师大孙望先生给我的一封信,我想稍晚一点我也会写文章发表。我想告诉各位,我现在的状况,写好几个专栏,最大的困难就是,写几篇容易,连续写的话,找新题目很难,所以我这篇文章是肯定会写的。我当时发现了一整批唐人佚诗,我写信告诉孙先生,他能够用他就用了,但是后来发现《全唐诗外编》出来以后他并没有用。我手上至少还有一两百首唐人的佚诗,就提出一个疑问,我这是偶然得知还有这些遗留,若系统地加以追究,会是什么样的情景?所以在1980年代时,运用前人所说的以目录学来治学的基本方法,先是做唐诗,后是做唐文,系统地收集和整理唐代文学文献的过程中,逐渐地接触文献,认识到前人的工作是有一点随得随录,包括《全唐诗》形成过程中胡震亨和季振宜的工作,当年其实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接触了多少的文献,就做了多少编录。《全唐诗》当年所做的增补工作,其实是也很有限,在我前面,出过《全唐诗》的外编,三位学者是王重民先生、孙望先生,还有童养年先生,这三位大概补了2000首左右的诗。如果不是系统地接触文献,觉得他们已经穷尽了,但当年

我还有些佚诗,于是就引起了疑问。当时其实最基本的方法就是,用目录学的方法,系统地掌握全部存世典籍,逐种逐篇地去翻阅,去和《全唐诗》对比,我印象中是1982年到1983年期间开始工作,最初的工作做了两年,找到唐人的佚诗2000首左右,后来做了一些增补,连原来的《全唐诗外编》做了修订以后,整个的唐人佚诗,发现有6000多首,达到了清编《全唐诗》的1/9到1/8,当时觉得确实是一个很意外的收获。

我在这里也不回避地讲,当时的工作带有很大的盲动性和局限性。所谓盲动性,首先,当时能看到的书要比我们现在少得多;第二个,当年的许多书是没有办法检索的,当年的工作是完全凭手翻的,最多利用一些基本的文史工具书做一些备察和考订,所以重收误收的情况非常之多。现在也有一些青年朋友发现问题指出我的错误,实际上有他们的努力,也因各个不同的阶段,所提供的机会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现在,也还在重新做全部的文本。在做完《全唐诗补编》之后,我又做了《全唐文补编》,从总体的学术质量来讲,也就像清代的《全唐文》质量比《全唐诗》更好一样,我做的《全唐文补编》的质量要比《全唐诗补编》的质量好很多,那是因为也是经过好几次反复的修订,但是问题都有,这个问题不大。

我在这里面,特别是要说明,最近的几十年之中,在唐代文学研究之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新文献层出不穷。第一,是敦煌文献。敦煌文献说起来是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以后,引起学界关注的。但是以前敦煌文书利用非常困难,一直到1960年代以后,缩微胶卷逐渐流行,到1980年代,敦煌学在国内带动了第一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时期,一是1980年代前期,台湾影印了敦煌宝藏;另外,当时好几个地方,包括杭州大学,包括北京大学,买了整套的缩微胶卷,当时缩微胶卷比敦煌宝藏稍微好一点,有关的研究是在这个层面展开的。然后1990年代的时候,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法藏和俄藏的敦煌遗书,以后又有各种新的变化。在这一点来讲,可以说,敦煌遗书的发现,带动了唐代文史研究的一种全新的格局。我在这里是说,存世的文献,保存下来,是有局限性的,主要是精英的文献,而敦煌文书,立体地展现了唐代社会一个角落之中系统的文献。当然它里面佛经的比重很大,但是其中与文学有关的,包括民间说唱类的文学,包括唐人写本的诗歌在社会各个层次流动的状态,以及敦煌特殊的情况之下,各种诗文的流动状态,所以它不一定是经典的,家喻户晓的篇章,而是立体地展现了一个社会生活的多个层面。因为敦煌学是最近几十年中的显学,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所知道的还有另外几个不同的层次。

第二个,清中期以后,《四库全书》编修以后,新出现的传世文献。这一类常常是一般人所忽略的,比方说《旧五代史》是从《永乐大典》里边辑佚出来的,《旧五代史》里边所收的诗是《全唐诗》所没有的,这样的书还有很多很多。

第三个,佛道两藏,佛藏和道藏,清代的一般读者是很少阅读的,一般人阅读的只是很少的几部书,能够读过《五灯会元》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是日本和韩国所流传的佛藏典籍的数量,比中国本土所流传的佛教典籍的数量,要大得多,而且质量品相都要好得多,日本许多寺庙还保存了唐宋时候大量原生态的写本和刻本,在这种情况下,佛道两藏之中,包含的文学文献,数量非常巨大而值得充分的重视。举一些特别的例子来讲,我前几年整理朱东润先生的遗著,发现他的一篇文章,他在《续高僧传》之中读出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对佛教的不同态度,以及施政的能力和心胸气象的不同。朱先生认为,在唐初的那种氛围之中,史官受到了正统史学之影响,对于隋一代加以极力地丑化,但是佛藏之中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因此《续高僧传》中对于隋代两帝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把朱先生的文章整理了出来。后来偶然碰到调到浙江大学来的孙英刚教授,他说他刚刚有一篇文章写完,他在《续高僧传》里读出了唐太宗的儿子,就是太子承乾,做太子期间十几年的活动,他与僧徒的来往,以及他个人的行为和品行,也是发现了完全与正统的史学完全不一

样的叙述。

最近,我的一个学生在人大做博士后,他在《续高僧传》中读出了唐初武德年间,山东的寺院对于唐政权之反抗,以及唐人对寺院的镇压,文章马上在《世界宗教研究》和《史语所集刊》上发表。我觉得,会读书的人,会在这样的典籍之中,读出完全不同的味道,这个是很有趣的情景。

还有道藏,道藏现在研究的程度比佛藏差很多,但是国际上的道藏研究是一门显学。道藏所存的东西其实是包括了大量六朝的古道经,以及唐宋两代很多的道经。当然道藏里面的伪书很多,而且时代确定不容易,但是道藏中涉及的有关文学的文献数量很可观,比如六朝之中,可以确认的,那一种道书之中的歌诗,现在我看到的有几百首到上千首。那时候可以看到,在主流诗歌以外,在道徒之间的,见诸诗歌和偈诵之间的那一类诗歌的不同面貌。所以我最近做完《全唐诗》以后,马上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把逯钦立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的修订做完,现在确定的体例是把道藏歌诗另外抽一本出来,另外做一编,提供给大家了解。应该来说,现在国内外许多的学者之中,对于道书年代的判断已经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我们把这类东西整理出来,供治文学的学者比较方便地使用,我觉得也还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工作。

四

前面是讲到,在文学研究的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实际上最近的几十年之中,史学的变化比文学的变化要来得多,大得多。大得多的原因,我觉得有些情况可能同学们了解,有些情况不一定了解。就是说在最近的几十年之中,中国的史学界,以唐史学界为例的话,实际上是正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发生了转变)。在1980年代前中期的时候,我最直接的感觉,唐史的研究比唐代文学的研究水平差太多了。当时我也是想和一些做唐史的学者套一点近乎,我曾经在一次外出度假的时候碰到复旦一位做唐史的前辈,我觑着脸和他去套近乎,我说,我最近在做《全唐文》,我觉得《全唐文》让我和史学的关系还近一点,那位老先生很严厉地告诉我,他说,我做唐史,我不看《全唐文》,这样一讲以后我马上就退了,这样就没有话好说了。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在最近的几十年之中,唐史学者对于文本之解读花的力气可能比做唐代文学学者花的力气更大。我碰到做唐史的年轻学者,他们告诉我,陈老师,你出版的《全唐文补编》中的每一篇文章,我们都认真地抠过了,意思是说,这些《全唐文》中,提供了多少对于唐史研究有意义的材料,他们都认真地推敲过了。其中我知道,有一些方面,他们可能做的更好,比方说现在在社科院历史所的雷闻,他的学位论文做的是唐代的国家祭祀,我在《全唐文补编》里提供了唐代诗人陶翰所写的《华岳真君碑》,以及在天柱山,即霍山里的《南岳祭祀碑》,他根据碑所提供的线索再去追究拓本,然后恢复出唐代国家的五岳祭祀的许多真相,在这样的层面上展开一些工作。

这几年之中,我感觉到唐史学者的变化,我特别要告诉做文学的各位朋友,这些年中,唐史,或者中国史学的各种变化之中,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资源,就是受港台的新史学,或者说新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启示。所谓在新社会史的研究之中,其中一篇代表性的论文是台湾的《新史学》发表的杜正胜的文章《什么是新社会史》。新社会史认为,我们不必去关心一个朝代之兴亡,也不仅仅是讨论历代君王和某某大臣他们的功业,我们应该更多地关心在这块土地上中国人生存状态,包括他的收成,他的食物,他的信仰,他的思想,他的生存状态,他的婚姻,他的祭事,他的医疗保障,以及其他种种的情况。我觉得,新社会史的提出,和传统史学的相比较,以及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正统史学来比较的话,它更为多元,更为立体,把包括宗教信仰、日常生活、家庭妇女婚姻等等一切社会生活之各个方面,都纳入了史学的范畴。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在另外一个层面上,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在新史学或唐史的研究中,对于基本的学术规范之遵守,以及对讨论的问题的反复推敲,其实都有一些比较好的规范。我知道复旦有一批做中国史的学者近些年很活跃,同时,我始终关注着港台地区、日本从传统的研究到现在研究的各种变化。我自己是一个对史学有浓厚兴趣的人,所以近几年有的文章我在提到严耕望先生的工作的时候,我是觉得严耕望先生早年所提出的研究唐代历史文献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很好)。做唐代人文地理的研究还是做唐史文献的研究,他在两者之间犹豫不决的时候,由于钱穆先生的建议而转做人文地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学理上的解释,而是两者之中只能选其一的一个偶然的决断。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是认为唐代基本史学文献之重新建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有学术意义的工作,这些工作实际上是需要学者长期建设努力才能够完成的。

而现在唐代史学研究的许多变化之中,我觉得很多方面都对文学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比方说我自己做过的一篇文章——我是十多年以前在日本待了半年,他们要求做几次讲座,自己拼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发表过,题目叫《唐代的亡妻与亡妾墓志》。我这个文章就是在说明,唐人是如何叙述自己的家庭生活,如何叙述自己配偶的生平和生活,如何表达夫妻之间的情感,以及唐代家庭生活的种种面像。我始终是相信,唐代的妇女、家庭、夫妻关系,以及与夫妻关系有关的文学表达,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各个社会面像的问题,在文学研究中也并不失为一项很有意义的课题。就比方说我当年写那个文章的时候,见到的唐人为自己的太太所写的墓志,大概是80方左右,我近年陆续看到的这类墓志差不多有200方左右。这200方墓志大家想想看,是为自己最亲密的人写的传记,而且这里面对夫妻情感的表达,从文学研究的意义上来讲,是非常之重大的。大家不要把这些东西仅仅看作社会学的,我只做文学,我很单纯地只是讲文学,其实文学是多种层面上的,我是始终坚持这样的立场和原则的。所以文学的研究和唐史的研究比较来讲的话,我觉得愿意更多地受到史学研究的鼓舞和影响,所以我现在自己带的学生是在做文史相兼的课题,而且确实其中有许多的课题做出来了,有很重要的意义。

我还愿意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在最近几十年学术环境的改变中,和以前比较,现在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现在古籍在网上公开的数量非常巨大,基本的古籍都可以检索。从四库全书检索到中国基本古籍库,到今年中华书局所做的中华经典古籍库,这类工作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可以检索利用的各种手段。但同时也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比较方便地利用检索得到研究资源,我们还有多少人去读书?我始终觉得,古典文学的研究,古代文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看你读书多少的一门学问,仅仅靠检索做的工作总是浅薄的,总是隔一层的,和自己系统读书之所得必定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我在上海的《文汇学人》改版的第一期上,我和黄一农先生分别写文章,讲e时代的文史考据,那期《文汇学人》的封面是黄一农的画像,收我和他各一篇文章。我的文章叫《e时代考证的惊喜与无奈》,我在这里面讲到古籍可以检索以后给我们带来的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是这样的收获也给我们读书带来了种种问题,那一篇写作到现在应该也有五年了,但至少我现在还是这样的感慨。我们能够体会到现在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与前代相比已经彻底改变了,我的态度就是,一个学者,要善于使检索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所利用,但是仅仅靠检索是做不出一流的学术研究的,一定程度上来讲,课题之发现,文本之系统的理解,以及最重要的,文史研究中对所利用文本精致度的把握,这个应该是自己在在处处应该特别留心的。

五

我自己在几十年的治学过程中始终在追求学问的富贵气。什么叫学问的富贵气呢?李清照

批评陈后山的词：词是写得很好的，但是如同贫家少女，中乏富贵态。我可以和各位说，文史研究之中，最怕俭薄，最怕寒酸样，学术研究始终是坚持要有富贵态，这种富贵态是在在处处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你在研究一个课题的时候，书的引用能不能做到一丝不苟，最基本的，你检索所得的材料，你是不是能够和原书去复核一遍，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工作；第二个层次，你用的这个书的版本，是不是最好的，一个书的版本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特别是现在通过网络，世界各个国家许多的图书资源，都有网络版可以检索，我们就会发现，在在处处对于文本的仔细讲究是学术精致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当然也是因为这样的条件，我可以报告各位我最近在做的工作中直接的感触，我从研究生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从1981年开始，做与《全唐诗》有关的工作，延续到现在为止，快40年了，最近一两年总算可以看到快要完成的曙光了，最近在全力以赴做最后的定稿，头绪非常多。我是做整个《全唐诗》的重新写定，这个工作在最近十多年中由于有一些人事的变化，受到意外的刺激，我想这些不必在这里讲，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但是有些时候人是需要一些意外的触动，推着你往前走，我最近十年中受到这样一种意外力量的推动，全力以赴地做这样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很坏的习惯，比如我在刚刚懂事时就听毛主席说要关心国家大事，我这几年中居然把这样的习惯完全戒掉了，不再关心国家大事了，只关心自己在做什么。现在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各位，现在用电脑写作，复杂文献的系统表达，能够做到的程度，前人根本难以想象。至少现在的情况之下，唐代的五万多首诗，我是在电脑中开了一万多个文档，每一本书读过以后，见到一首诗就开一个文档校一下，开一个文件校一下记录下来。这样的情景下，最近十多年的工作，可以说有一些收获：如果不是这样系统地、详尽地校书，是做不到的。

比方说崔颢的《黄鹤楼》之中的第一句，到底是“昔人已乘黄鹤去”，还是“昔人已乘白云去”，我们现在看到的明清的文本都说“昔人已乘黄鹤去”，然后别人还讲文本里有三个“黄鹤”有多少好，其实现在唐宋所有看到的早期文本全部都是“昔人已乘白云去”。我利用包括宋人的拓本，包括敦煌的文本，包括其他各种宋本，校了几十种宋以前的文本下来，逐次都有记录，那一些东西其实都清楚了：“昔人已乘黄鹤去”是后来人改定的。后来人觉得是这样的文本好，其实真的差异很大。有一些文本，比方说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唐百家诗选》的宋本作“白云”，但是到清代四库本已经把它改成了“黄鹤”，这种改动如果不是详校了各种文本是无法悉心理会出来的。

我们讲古人的文章反复地改，我们现在可以看到颜真卿的《祭侄文稿》改了很多，其实我在做《全唐诗》的过程之中，一首诗的文本可能被改动了几十次，像白居易的一个文件，我知道我在里面已经改动了几千次到上万次，而且任何一个碎片都不断地贴进去，不断地修订和改正，这样的写作只有现代的手段才能达成。而且更重要的在于，这样一部大书的工作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所以我知道这首诗这里的改动应该连动地改动哪几个地方，所以在全书追求一致的方面，成于众手和一个人做是完全不同的工作。

我自己也可以在这里报告各位，自己在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从前以搞基本文献、写考据文章为主；最近几年中，大概是有几个阶段的变化，现在写各种通俗的文章，写各种游戏的文章，写各种场面上的文章，居然还能够应付自如。我以前看莫砺锋的文章，作品的反复解读写得真好，我并不是一个主观而自信的人，所以看到别人好的东西我是看到了自己和别人的距离。这几年我自己文风的变化，我觉得和别人的距离还不是太大，至少我觉得自己还是有一些进步。各位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我以前的文章都写得庄重有余，活泼不足，但这几年真的变化很大，可以写出各种不同面貌的文字。但是有一点，觉得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文章还是尽量地不想重复，不想啰嗦，还是希望每一篇文章都能有一些新意。